

历史与阶级意识 2.0^{*}

——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时代的卢卡奇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著^{**}

王立秋 译^{***}

摘要:本文讨论了格奥尔格·卢卡奇 1923 年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的现实意义。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意识形态、物化、物化意识概念,在今天的大数据和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依然重要。《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物化、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时代依然高度切题。卢卡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批判地分析社交媒体、大数据和其他各种网络技术是怎样被当作物化的工具来使用的。同时,卢卡奇也提醒我们,只有人的实践才能得出替代方案。

关键词:历史与阶级意识 格奥尔格·卢卡奇 数字资本主义 物化 物化意识 网络

一、引言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哪些元素,可以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传播批判理论提供依据?为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分为五个部分:除第一部分引言外,第二部分分析意识形态与物化的意识;第三部分主要关注新闻与物化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讨论传播技术的物化;第五部分提出一些结论。基于对卢卡奇的解读,本文意在说明,卢卡奇的论述可以用来批判地分析当代的数字传播。

* 本文原题为“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2.0: Georg Lukács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Big Data”,原刊于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4(15), pp. 2258-2276, 经授权翻译发表。

**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德国帕德博恩大学媒体研究系。

*** 王立秋,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吕迪格·丹内曼(Dannemann, 2017)认为,今天,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数字新世界中更新卢卡奇的物化现象学”,用它来思考当代物化现象“独特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以及其“技术的维度和人的独特性”。本文便是在这个方向上做出的努力。

二、意识形态与物化的意识

(一) 物化

“物化”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范畴,卢卡奇用它来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特别是意识的结构影响。“物化”概念源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

“商品-结构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物的特征并因此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客体性’,一种看起来如此严格合理而无所不包,以至于掩饰了其基本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自律性”(Lukács, 1971:83,以下略作HCC)^①。在这里,卢卡奇提到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1.1节)的一段话。在那里,马克思说商品有某种“像幽灵一样的客体性”(Marx, 1867:128)。通过使用这个隐喻,马克思想说的是,商品的价值以货币的形式出现,表现为商品的价格,但其实质——工人为生产商品而必须在阶级关系中耗费的平均劳动时间——依然隐而不显。

在近来哲学和批判社会理论领域的争论中,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颇为显眼。比如说,罗萨(Rosa, 2013)把加速诠释为一个异化过程。耶基(Jaeggi, 2014)认为,物化意味着人类主体无法占有世界和自我。阿克塞尔·霍耐特(Honneth, 2017)是近来最为直接地为落实卢卡奇“物化”概念而努力的批判理论家之一。他认为,物化意味着社会不尊重人的存在或对人的存在缺乏承认。在卢卡奇和霍耐特的基础上,福克斯(Fuchs, 2020)把剥削、政治

^① 文中卢卡奇的引文均由译者根据上下文译出,同时在脚注中列出中译本以供参考。此处参见卢卡奇,2017,《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第143—144页:“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饰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译注

压迫和意识形态识别为压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这个论证与大卫·哈维 (Harvey, 2018) 近来的作品一致,后者指出,异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它不但在阶级关系中,也在诸多社会领域中发生。合起来看,这些作者表明,物化意味着人面临他们无法控制的境况,在这样的境况下,人和社会的潜能无法实现,某些群体为实现片面的利益而把其他群体给工具化了。这种对物化的理解,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物化的概述是一致的。卢卡奇的理论依然是 21 世纪批判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点。

(二) 作为物化的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

阶级意识是“由生产过程中特定类型的位置‘决定’(zugerechnet)的适当的、合理的反应”(HCC, 51)^①。被赋予(imputed/ascribed/attributed)那个类型的位置的阶级意识(zugerechnetes Klassenbewußtsein)是客观的阶级意识(HCC, 323)。^② 客观的阶级意识是由主体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决定的,它不仅仅是经验的意识,而且是一种意识的“客观可能性”,即“人在特定情景中,在能够评估那个情景和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就它们对直接的行动、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而言)的情况下会有的那些思想和情感”(HCC, 51)。^③ 虚假意识则是“绕过社会演化的本质,未能准确指出这个本质并对之加以适当表达”(HCC, 50)^④的意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有双重性质:

(1) 资本主义有天生的拜物性,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不会完整地经历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和过程。如此,商品和货币所获得的“物的地位”(thing-status)隐藏了支撑它们的阶级关系,使资本主义看似别无选择的自然的、无限的系统。

(2) 自然化是普遍而言的意识形态的一大特征,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策

① 参见中译本第 104—105 页:“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译注

② 参见中译本第 429 页:“因此这里的问题是,客观的、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本身是否必须被看作是有分歧的和分阶层的。”——译注

③ 参见中译本第 104 页:“与具体的总体及由此而产生的辩证规定的关系超越了这种单纯的描述,并产生了客观可能性的范畴。将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就能认识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认识与客观状况相符的思想和情感等等。”——译注

④ 参见中译本第 104 页:“(意识)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译注

略,它使支配看似必然、永恒、无限而不可避免,从而实现为压迫正名,赋予压迫合法性的目的。对卢卡奇来说,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必要的合法化特征。“掩盖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对资产阶级本身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欺骗其他阶级,确保它们无法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的需要对资产阶级政权来说是不可避免的。”(HCC, 66)^①

就像存在由管理者、顾问和资产阶级科学家、知识分子与记者等来进行的生产意识形态的劳动那样,也存在劳动的意识形态:根据卢卡奇,加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一部分,其中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物自体处于一种神话化却又相当纯粹的状态”(HCC, 192)^②。

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语言的物化来起作用的。卢卡奇引用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在脚注中评论:“马克思进而做了大量关于物化对语言的影响的精妙评论。在这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展开哲学研究是有益的。”(HCC, 209, n18)^③在卢卡奇提到的那段话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买卖关系”渗透和塑造了语言:

例如,propriété、Eigentum(财产)和 Eigenschaft(特性),property、Eigentum(财产)和 Eigentümlichkeit(独特性);重商主义意义上的和个人意义上的 eigen(自有),valeur、value、Wert(价值);commerce、Verkehr(商业、交往);échange、ex-change、Austausch(交换);等等。所有这些字眼即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Marx & Engels, 1846:231)^④

① 参见中译本第 129 页:“因此欺骗别的阶级,让它们没有清楚的阶级意识,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存在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但是,掩盖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对于资产阶级本身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译注

② 参见中译本第 292 页:“同样是革命的加尔文教派把证实自己是虔诚的伦理学(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和认为推动世界运动的、规定人的命运的内容的客观力量完全是超验的这一点(隐秘的上帝[Deus absconditus]和先定学说)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意味着是把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自在之物结构神话化了,并使之更加精练了。”——译注

③ 参见中译本第 160 页:“接着这种考察,就是马克思对物化结构深入到语言里去这种现象作的非常出色的评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进行语言学研究可能得到很有趣的成果。”——译注

④ 这段话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里使用的译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 1 版第 1 卷第 255 页。——译注

物化的社会也造成了物化的语言。牛津词典中包含的物化语言就表明了这个现象的存在,比如说,它把传播定义为“通过说、写或使用其他某种媒介来传授或交换信息”^①。就用特定数量的一种商品来交换特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 x 商品 A = y 商品 B——而言,交换是一种社会关系(Marx, 1867:163)。在传播中,你不会预期用 10 个词来“交换”10 个词。的确,一个人可能说出一个由 10 个词组成的句子,而另一个人则可能用 1 个词或一句由 20 个词组成的句子来回答。总的来说,语言不是商品,虽然客体化的语言可以变成商品,以特定数量货币出售的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表明,资本主义中的商品形式不但物化了社会关系,作为物化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它也物化了作为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介的传播和语言。

在英语中,“交换”一词源于拉丁语的 *excambiāre*、盎格鲁-诺曼语的 *eschanger* 和古法语的动词 *eschangier*。^② 在 16 世纪重商主义兴起之际,“交换”变成了用来指“商人或放款人会面交换期票的实践”和“兴办商行”的通用词。^③ 拜物教使特殊的看起来像是普遍的。传播是所有社会都有的普遍特征,而交换则只存在于阶级、市场和劳动分工塑造的社会。作为商品贸易的交换和作为传播的交换在语言上的混合创造出这样的印象,即市场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的必要特征。作为资本主义拜物教对语言的影响的结果,牛津词典同时把交换定义为“简短的谈话或辩论”和“交易某种或某几种商品”,“涉及货币、股份等的商业买卖进行的系统或市场”和“把货币换成其他国家的等值货币”。^④

《历史与阶级意识》最长的一章“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写于 1923 年。当时,鉴于纳粹还没有上台,俄国革命才过去五年,卢卡奇对无产阶级革命潜能的态度还相当乐观。他认为,资产阶级有的是必然虚假的意识,而无产阶级也不是自动就有了革命意识,它只是有看穿拜物教的可能性。比如说,在像这样的表述——“无产阶级的意识依然为物化所束缚”(HCC, 76)^⑤,或资本主义在把“资

①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communication>.

② <https://en.wiktionary.org/wiki/exchange>.

③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exchange>.

④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xchange>.

⑤ 参见中译本第 142 页:“仅仅是隔离的事实就已表明,无产阶级的意识暂时还屈从于物化。”——译注

产阶级囚禁在这种直接性中的同时迫使无产阶级超越之”(HCC, 164)^①——中,就可以看到卢卡奇在政治上的乐观主义。

与在 1933—1945 年间或在今天相比,在俄国革命之后的几年里,人们肯定有更多的理由来乐观估计无产阶级的现实性。但总的来说,《历史与阶级意识》没有过度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现实性,而更强调无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因此,卢卡奇谈到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危机”(HCC, 305)^②。物化是“每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HCC, 197)^③。“无产阶级自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以来都在面临的危险在于,它可能和资产阶级一起被囚禁在它的直接性中。”(HCC, 196)^④无产阶级可能没法“迈出”变成“历史的同一主体-客体”这一步,而只有这样的主体-客体“的实践,才会改变现实”。同时,资本主义也使“物化形式的量的增长”和“对物化形式的破坏”成为可能(HCC, 208)^⑤。革命意识不是自动产生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得到改造和解放”(HCC, 208)^⑥。“在涉及无产阶级的意识的时候,历史是最缺乏自动性的。”(HCC, 208)^⑦“尤其是,只有在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商品的时候,工人才能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HCC, 168)^⑧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HCC, 310, 德语原文为 *Verbürgerlichung*)^⑨的原因有三:工人阶级的特权部门的出现(HCC, 304-305)^⑩,资本主义物化结

① 参见中译本第 256 页:“由于阶级利益的推动,这同一个存在使资产阶级被禁锢在这种直接性中,却迫使无产阶级超越这种直接性。”——译注

② 参见中译本第 409 页:“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根本不能设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危机,不能设想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译注

③ 参见中译本第 300 页:“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物化是必然的直接的现实。”——译注

④ 参见中译本第 298 页:“无产阶级从它登上历史舞台起就不断面临着危险是,它和资产阶级一起陷入了存在的直接性之中。”——译注

⑤ 参见中译本第 314 页:“一方面是物化形式的越来越空虚(可以说是它们的外壳由于内部的空虚而破裂了)……而另一方面是它们的量又在增加。”——译注

⑥ 参见中译本第 314 页:“就无产阶级的意识来说,发展是不会自行发挥作用的……即变革和解放只能出自自己的行动。”——译注

⑦ 同前注。——译注

⑧ 参见中译本第 261 页:“只有当工人意识到他自己是商品时,他才能意识到他的社会存在。”——译注

⑨ 参见中译本第 414 页。——译注

⑩ 参见中译本第 407—409 页。——译注

构对意识的影响(HCC, 310)^①,以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政党和工会的驯化。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秉持这种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沦为物化的所有二律背反的受害者”(HCC, 197)^②。卢卡奇认为,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来说,共产党发挥着重要作用。“共产党的斗争聚焦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HCC, 326)^③

(三) 线上右翼威权主义和新民族主义:网络上的物化意识

自从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于 2008 年暴发以来,从主流的反应来看,政治左翼并没有得到强化,反倒是右翼威权主义和新民族主义崛起了(Fuchs, 2018a)。在世界的多个地区,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得到了蓝领工人的大力支持。摩根(S. Morgan)和李(J. Lee)分析了美国 1 142 个地理单位(按美国社区调查定义)的投票行为和职业结构之间的联系。这个分析定义的工人阶级,包括低水平服务业劳动者、熟练的体力劳动者、不熟练的体力劳动者、农场主、农业劳动者和最高学历为高中文凭的无业个体。分析发现,“联系罗姆尼 2012 年更加典型的表现——作为一个差一点就取得成功的共和党候选人——来看,特朗普在 2016 年多得的选票,大多来自那些可被识别为白人工人阶级成员的合法选民占比最高的地区”(Morgan & Lee, 2018:239):

对 1 142 个地理单位的补充地区分析表明,特朗普在 2016 年比罗姆尼在 2012 年多赢得的选票,与各地理单位投票人口的白人工人阶级部分强相关。这个强相关在特朗普落选的六个州稳定不变,在其他类型的州略有变化……我们分析的结果支持这一主张,即特朗普对白人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对他的胜选来说至关重要。(Morgan & Lee, 2018:240)

在许多国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即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的政客和政党纷纷在选举中获胜。在许多地方,蓝领工人大力支持此类政治(Fuchs, 2018a),这

① 参见中译本第 414 页。——译注

② 参见中译本第 299 页:“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使无产阶级完全陷入了我们已经深入地分析过的物化的矛盾之中。”——译注

③ 参见中译本第 432 页:“共产党的斗争集中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上。”——译注

表明,自 2008 年以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物化蓝领工人意识的倾向有所强化和扩大:在这部分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屈服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即认为不平等和社会问题的原因不是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而是移民、难民和其他民族。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向人们呈现一种建构出来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各种建构出来的作为分层分类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分散人们对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冲突的关注。而在过去几十年里,造成以牺牲工资份额(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为代价提高利润和资本份额(利润和资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这一结果的,正是后者(Fuchs, 2018a)。

像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那样的社交媒体,是当代右翼政治的主要工具。在过去几年里,作为卢卡奇所谓“物化意识”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的结果,关于右翼对网络的使用的分析也变得更加重要(Ernst, Engesser & Büchel et al., 2017; Müller & Schulz, 2019; Stier, Posch & Bleier et al., 2017)。民族主义者在网络媒体上传播右翼威权主义的四个方面:自上而下的领导、民族主义、敌友之分以及建构出来的敌人斗争的需要(Fuchs, 2018a)。

在这里,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Breitbart 是一个经常把民族主义宣传放到头版头条、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极右翼线上新闻门户网站。其前执行董事斯蒂芬·班农(Steven Bannon)曾任特朗普竞选团队主管,并于 2017 年 1—7 月任特朗普政府的白宫首席战略师。但特朗普与 Breitbart 的联系比那还早。2014 年 7 月 11 日,Breitbart 刊发了特朗普一篇题为《不能保护自己边界的国家不会长久》的文章。在文中,特朗普写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塔穆雷西中士为我们的国家牺牲,在奥巴马欢迎非法移民的同时,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却被关在墨西哥的监狱。墨西哥允许数万人跨越他们的国家来到我们非常愚蠢地在墨西哥边界“开放的门”。老实说,塔穆雷西中士是唯一一个不能进入我们国家的人了!……在我看来,显然,一个不能保护自己边界的国家不会长久。家里的人呢?我们不管我们自己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担心,奥巴马就是那样打算的。……这个问题很容易用领导能力来解决。我们却没有任何像样的领导能力。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可悲的时代。(Trump, 2014)

为推广自己的文章,特朗普把这篇文章的链接分享到推特上。此文背景是,海军陆战队前中士安德鲁·塔穆雷西在车载三支上膛枪支非法跨越边界后被关进了墨西哥的监狱。在特朗普的文章里,可以看到右翼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部四个要素:

第一,敌友之分。特朗普建构出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民族冲突。他说墨西哥允许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并把美国士兵关进监狱。墨西哥为移民提供途径、监禁前美国士兵(塔穆雷西不是以士兵身份,而是以被指控违反墨西哥法律的私人个体的身份入狱的)被说成是在伤害美国公民。

第二,民族主义。特朗普通过大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我们自己的”利益或“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建构出一个与墨西哥对立的美国公民的“我们的”民族认同。特朗普呈现了一个“我们”VS“他们”的差异,其中“我们”(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墨西哥)对立。

第三,军国主义。特朗普谈到“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却被关在墨西哥”,是为了论证美国士兵是最光荣的个体,因为他们拿起武器争取美国利益。总的来说,特朗普崇拜士兵和军队。在他的意识形态中,士兵是人的理想类型。他认为美国的国家暴力是适当的,但他同时又谴责墨西哥对美国公民执法,暗示制裁违反墨西哥法律的美国士兵是不义的。特朗普把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偏见混到一起以创造这样的印象,即墨西哥与美国之间存在民族冲突。

第四,强力领导。最后,特朗普认为,非法移民和所谓“美利坚民族的毁灭”(“一个不能保护自己边界的国家不会长久”)要归咎于奥巴马所谓“孱弱的领导能力”(“我们却没有任何像样的领导能力”)和在“墨西哥边界开门”的政策。特朗普暗示,他本人会是一个强力的领袖(“这个问题很容易用领导能力来解决”),并因此为自己在2016年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做准备。

为行之有效,意识形态需要以没完没了的小报新闻、丑闻、爆料的形式得到复制。右翼势力用社交媒体传播自上而下的领导、民族主义、敌友之分、军国主义/法律和秩序政治的意识形态。社交媒体是一种适合用来传播假新闻和右翼宣传的媒介,因为它简短而肤浅,高速运作,能够通过使帖子在网络信息空间中传播而在短时间内触及广大受众,支持“点赞”形式的情感和其他情感的放大,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推特、脸书和油管(YouTube)像小报一样的结构也支持了右翼意识形态的线上传播。资本主义社交媒体之所以容忍右翼宣传,是因为其

内容和数据的巨大流量,会通过定向广告带来更高的利润。社交媒体不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物化意识的原因,但它是右翼煽动家用来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工具之一。右翼崛起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政治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创造出一种否定的辩证法。其中,市场的自由激化了恐惧和不平等,后者又以支持右翼意识形态、政客、运动和政党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民主人士和左翼活动家也试图通过社交媒体来挑战极右翼意识形态,传播不同的故事和世界观。但无疑,右翼威权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持续物化无产阶级意识、掩饰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的作用。

下一部分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础上讨论新闻与物化的关系,把《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像社交媒体、线上假新闻、定向广告、算法和政治机器程序(political bots)那样的数字现象联系起来。

三、新闻业与物化

(一) 卢卡奇论新闻业

意识形态不独立于人而存在,它必然是在社会关系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卢卡奇提到了作为意识形态生产者的资产阶级记者。所谓“资产阶级”记者,指的是在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策略的帮助下,创作物化资本主义及其支配的报道的记者。资产阶级新闻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劳动,即创作意识形态新闻报道的劳动。

卢卡奇认为,体力劳动者对物化的体验相对直接。他们的劳动“直接具备赤裸的、抽象的商品形式,而在其他形式的劳动中,这(物化)隐藏在‘脑力劳动’‘责任’等的外表下”(HCC, 172)^①。“物化越是深入到把自己的成就当作商品出售的人的灵魂,其外表就越是具有欺骗性(就像在新闻业那里那样)。”(HCC, 172)^②记者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及其作为保障言论自由、努力使权力变得透明的

^① 参见中译本第265页:“他(无产阶级)的劳动早在他的直接具体的存在中,就已具有一种赤裸裸的抽象的商品形式,而在其他劳动形式中,这种结构是隐藏在‘脑力劳动’‘责任’等等假面具后面的(有时是在家长制形式的后面)。”——译注

^② 参见中译本第265页:“物化越是深入到把自己的成果作为商品出卖的人的‘灵魂’之中,这种假象就越有欺骗性(如新闻业)。”——译注

民主第四阶级的精神气质,很容易掩盖他们身为雇佣劳动者的地位。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评论说:“记者‘缺乏信念’,出卖自己的经验和信仰,这只有在被当作资本主义物化的顶点,才是可理解的。”(HCC, 100)^①结果,资本主义新闻业生产的新闻往往物化了资本主义和支配。在刚才引用的那段话的一则注释中,卢卡奇(HCC, 210, n24)^②提到了贝拉·福加拉西(Béla Fogarasi, 1891—1959)的一篇文章(未提及它的标题)。福加拉西和卢卡奇一样是匈牙利共产党员,他们都是1915—1918年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思想讨论团体“星期天圈子”的成员。卢卡奇提到的福加拉西的那篇论文(Fogarasi, 1983)《共产主义报刊的任务》发表于1921年。

该论文区分了资本主义报刊和共产主义报刊,认为资本主义报刊是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为支配“所有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使用的“意识形态工具”(Fogarasi, 1983:149):

资本主义报刊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塑造读者的意识结构:持续地使之无法区分真假,联系因果,把个体的事实置入总体的语境,理性地把新知识纳入自己的视角。(Fogarasi, 1983:150)

福加拉西含蓄地把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应用于批判资本主义报刊。资本主义报刊关注的焦点,往往不是总体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之间的辩证,而只是个体的、孤立的新闻报道。根据福加拉西,资本主义报刊的策略包括报道诸多满足读者对知识、去政治化和刺激的饥渴的孤立事件,这些事件系统地服务于分散注意力、伪-客观性的目的。与之相对,共产主义报刊则试图促使人们意识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和单个事件彼此之间,以及与更大语境的联系,揭穿资本主义报刊,使读者也作为报道的生产者参与进来。

福加拉西不但把卢卡奇的“物化”和“总体性”概念应用于新闻业,而且他在1921年就预见了本雅明(Benjamin, 1934:777)把“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把“读者或观众变成合作者”的想法,和布莱希特(Brecht, 1932:42)让“收听者边

① 参见中译本第169页:“新闻工作者们‘没有气节’,出卖他们的信念和经验,这些只有当作资本主义物化的极端表现才能被理解。”——译注

② 参见中译本第169页脚注2。——译注

说边听”的广播的想法。福加拉西的论文还指出了媒体中的意识形态响应卢卡奇的“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概念的一些方面。

接下来的两个小节将说明,在当代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假新闻的时代,卢卡奇对作为物化意识的新闻和新闻业的分析依然切题。

(二) 新资本主义精神

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创意工作者对其劳动内容的爱 and 高度自主能力已经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掩饰了这个事实,即那些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往往是在不稳定的境况下为之。吕克·博尔坦斯基和埃芙·夏佩罗(Boltanski & Chiapello, 2005)在这个语境中谈到了“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新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管理意识形态,它许诺劳动者可以从事以下劳动:

自主的、自发的、有根茎活力的、多任务(与过去劳动分工狭隘的专业化相对)的、玩乐的、对他者开放的、新颖的、有益的、依靠直觉远见的、对差异敏感的、聆听生活经验的、接受所有经验的、偏向非正式的、与人接触的。

而这些特征就“直接出自1968年5月上演的节目”(Boltanski & Chiapello, 2005:97)。

新资本主义精神许诺知识劳动者可以从事不那么异化的劳动,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劳动过上艺术家、名人或记者的生活。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媒体行业的知识劳动者认为自己的劳动具有高度创造性,是自己决定的、自我实现的,但同时这个工作又高度不稳定(Maxwell, 2016)。罗莎琳德·吉尔(Gill, 2011)在总结这些研究的结论时,识别出文化和媒体劳动的10个特征:这样的劳动往往以从业者(1)热爱工作、(2)有开拓创新的企业家抱负为特征,它经常是(3)短期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的;(4)以低收入和(5)长工作时间为特征,(6)要求劳动者持续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它(7)基于自主学习,从根本上说(8)不正式,并且会(9)凸显与性别、年龄、阶级、种族、族群和残障相关的不平等,还会(10)剥夺劳动者规划未来的时间和资源。

与体力劳动相比,文化和媒体劳动看起来不那么物化和异化,但它往往被组织为不稳定的自由职业,不能给人充分的社会、工作和收入保障。从事创意劳动

的意识形态会物化文化劳动者的意识,使他们不把自己看作劳动者,认为自己是企业家,对工会组织抱敌意,把不稳定怪到作为个体的自己身上,看不到那是一种资本主义强加的阶级关系,等等。新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在通过创造去异化的表象来物化劳动的同时,还推行破坏社会和收入保障的、高度个体化的工作条件。那看起来没有被异化的,其实是一种新形式的异化。劳动者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反应是物化的还是非物化的意识,取决于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因素,即劳动者有没有集体地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发展出使他们能够看穿虚假表象背后的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意识。

(三) 线上假新闻的时代

靠广告盈利的媒体为吸引受众、拿他们来卖钱而注重煽情和娱乐,倾向于凸显支持资本主义的保守的世界观。谷歌、脸书和推特使用定向广告,这种技术允许它们在数据监控和大数据分析的帮助下对广告进行私人化的、个体化的定制。剑桥分析丑闻已经表明,数字资本主义基于定向广告的模式与民主冲突。2013年,剑桥大学神经科学家亚历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开始用脸书的开发者平台来做人格测试。结果,大约9 0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被收集并卖给了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而这家的副总裁正是班农。剑桥分析在竞选中用数据来为用户定制假新闻,这一举动被普遍认为是在试图操纵民主。在剑桥分析的影响下,对线上假新闻和线上后真相的批判研究剧增(Carlson, 2020; Duffy, Tandoc & Ling, 2019; Humprecht, 2019)。作为后果,脸书在2018年受到了公众的细查,因为它看起来是知道自己的定向机制被用于反民主活动的。线上定向广告使大公司能够通过自己的广告预算来针对用户投放公司和政治宣传,以达到操纵和殖民公共领域的目的。在线上世界,原生广告和品牌内容使人难以分辨广告和编辑内容,这就损害了新闻自主。

有利于精英和资产阶级的选择性外包(selective sourcing)也构成一个新的过滤器。与大众媒体不一样,线上传播基于一个去中心化的传播基础结构,在这里,原则上每个人都能生产和传播信息。在线上世界,权力的等级和阶级的结构化从对内容的生产,变成了对可见性和注意力的生产。公司、名人、传统和新精英支配着线上的可见性和注意力(Fuchs, 2017: 122-128)。比如说,2018年7月,路易斯·冯西(Luis Fonsi)的MTV《慢慢来》(Despacito)获得53亿6 800万

点击量,成为油管有史以来点击量最高的视频。^① 维旺迪环球音乐旗下的拉丁娱乐是冯西的歌和视频的发行商,这表明大型多媒体公司在油管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鉴于公司运营的社交媒体依靠广告来盈利,注意力也就可以被当作商品来购买了,而这对富有的公司和个人来说是有利的。

假新闻和小报一样古老,但在线上世界,假新闻能快速传播,可以针对个体定向发布,并且人们往往难以分辨假新闻语境下的线上行为是出自人还是算法。右翼运动试图利用社交媒体来传播自己的宣传,在线上挑战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与世界观。他们不但在线上使用机器程序和传统游说方法,还诉诸威胁、霸凌和仇恨言论。

资产阶级媒体经常散布意识形态,但它们不会只散布一种意识形态。本节我们已经通过一个例子看到民族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是怎样在线上流传的。网上的意识形态往往是视觉性的、小报化的。它利用诸如简单化、概括、情感化、丑闻化、两极分化、平庸化、操纵、捏造之类的策略。用户生成的意识形态意味着,生产意识形态的劳动不限于职业意识形态家,也包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是哗众取宠的、民粹主义的、简单的、诉诸感情并直接针对特定群体的。算法放大了那些得到高水平注意力的人的看法。结果我们发现,线上有这样一个倾向,即用算法来放大线上意识形态。

公司、名人和政治精英的行动造成的结果,是公共领域遭到了殖民。这些进程也在线上世界、社交媒体上发生,在那里,定向广告、算法、大数据、政治机器程序、线上假新闻、数字监控和其他机制被利用并导致类互联网的公司和政治分层。

在下一部分,我们将看到,传播技术不只是传播和挑战物化思想的一个媒介,其本身也形成了物化的一个对象。我们将用卢卡奇的作品来说明,我们该如何分析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意识形态。

四、传播技术的物化

(一) 卢卡奇论智力劳动者

在1919年撰写的论文《“智力劳动者”与智力领导权问题》中,卢卡奇

^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JQP7kiw5Fk>,访问时间:2018年7月29日。

(Lukács, 2014:12-18)认为,智力劳动者不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那些“和体力劳动者一样,能够只靠自己的劳动力参与生产的人(白领劳动者、工程师等等)”和“那些智力工作只是自身资产阶级地位的附属的人(大股东、工厂所有者)大不相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阶级区分对客观的观察者来说是如此地清晰,以至于没法把他们放到‘智力劳动者’阶级这一个标题下”(Lukács, 2014:12)。

“因此那些参与生产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阶级意识模糊的)‘智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同属一个阶级”(Lukács, 2014:13),智力劳动者不是一个“同质结构”的阶级,因为甚至在其内部也有清晰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分”(Lukács, 2014:13)。

(二) 信息社会中的知识劳动者

在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中(Webster, 2014),人们区分了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作为这一区分的一部分,人们常说,信息和知识劳动者构成了服务业内部的一个独特群体。正如卢卡奇指出的那样,此论证的问题在于,在生产过程中,管理者(维持对工人的控制、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人)和从事生产的知识劳动者(直接创造商品的人)处在同一个位置。

今天,知识劳动者的阶级属性甚至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许多创意劳动者从事的是自由职业:他们通过一次性合同出售自己的劳动,不具备雇佣他人所需的资本。在像数据录入员、软件和网站开发师、设计师、译者、作家、个人助理、编辑、校对员这样的知识劳动者中,自由职业特别流行。毫无疑问,只要自由职业者不形成一门除自己外也雇佣别人的生意,他/她就依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记者也要么是雇佣劳动者,要么越来越多地成为自由职业者:一方面,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记者、顾问和其他像卢卡奇写到的那样,通过在自己的著作中为资本家的利益正名从而为“物质的、意识形态的和权力的利益”服务的人,又和管理者一样,属于统治阶级。只有批判地调查资本主义的批判记者,才完全属于工人阶级而非统治阶级。

(三) 卢卡奇对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技术拜物教的批判

不但存在借助技术来传播的意识形态,也存在技术的意识形态。就数字技

术而言,我们不但发现网上的意识形态,也发现网络的意识形态。卢卡奇没用过“技术拜物教”这个术语,但他描述过技术是怎样变成神物的(fetish object)。他谈到“为人的特定目的(比如说,在技术中)而利用被认为是命定的、不可变易的规律”(HCC, 38)^①。技术拜物教“通过把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功能再现为它的‘永恒’本质”而扭曲了它“真正的客观属性”(HCC, 153)^②。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诸如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大数据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工业 4.0/工业互联网此类的数字技术,在资产阶级思想中经常被当作神物来对待。让我们来举例说明。总的来说,商业报刊是观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新动向的一个很好的材料来源。

2017 年 5 月,《经济学人》做了一期题为《世上最有价值的资源不再是石油,而是数据》的封面故事:“一种商品引发了一个利润巨大、快速发展的产业……一个世纪以前,这样的资源是石油。如今,经营数字时代的石油——数据——的巨头也引起了类似的关注。”(The Economist, 2017)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和微软是“看起来势不可当”的“巨人”。“巨头的成功也有利于消费者。几乎没有人想在没有谷歌的搜索引擎、亚马逊的次日达或脸书的推送的世界生活。”“算法能预报什么时候消费者要买东西,什么时候喷气发动机需要维护,或什么时候人有生病的危险。”《财富》(Fortune)刊发过一篇对英特尔 CEO 布莱恩·柯再奇(Brian Krzanich)关于大数据的访谈。“在 20 世纪头十年里,石油改变了世界。它驱动了汽车,驱动了整个化工业……数据,我把它看作新的石油。它将全面改变大多数产业。”(Gharib, 2018)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不但会改变行业,还将以某种积极的方式改变这个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

我想如果你去问雇员们,他们会说,他们从没见过公司以这么快的节奏变化、竞争。但我不认为你能停下来,在这个技术世界中,它够快了。

^① 参见中译本第 93 页:“第一条途径是,可以把按上述方式认识到的、被宿命论地接受的、不可改变的‘规律’用于人的一定目的(例如技术)。”——译注

^② 参见中译本第 241 页:“这种方法把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看作为机器的‘永恒的’根本核心,看作为它的‘个性’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从而歪曲了机器的真正的客观属性。”——译注

这些例子说明了技术拜物教的一些典型特征：

第一，自主性。技术被呈现为自主的，不受社会的权力结构制约，技术不处在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之中。在上面两个例子中，人们主要关注的都是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那样的技术会怎样积极地改变社会，而不关注它们如何内嵌于阶级结构、剥削和支配中。

第二，主体性。技术而非人被呈现为行动的主体（“石油改变了……”等等；数据“将改变大多数产业”；AI“将改变这个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这一策略的目的在于，通过把技术的发展呈现为不取决于人的意志和行动的，从而把这些发展物化为不可避免、不可改变、不可逃避、不可逆转的。

第三，革命。技术发展被呈现为革命性的，这些发展迅速发生，改变一切（“数据”是“新的石油”；“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就算“以这么快的节奏变化”了，“在这个技术的世界中”也绝“不够”）。这一呈现策略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去质疑废除某些技术或技术的某些方面。

第四，技术作为单维度的原因，数字决定论。技术被说成社会变革的原因（“它将以某种积极的方式改变这个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权力结构和社会矛盾被忽视了。

第五，技术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技术语境下，社会中的变革要么被说成纯粹正面的（技术乐观主义），要么被说成纯粹负面的（技术悲观主义）。比如说，在上面举的例子中，人们声称大数据有利于消费者，几乎没有人想在没有它的世界中生活。或者说，算法能预报人什么时候“有生病的危险”并“以某种积极的方式改变……每个人的生活”，而根本没有谈到技术实际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伤害，如算法监控、算法歧视、误差和错误预报带来的弊端等。

（四）卢卡奇对量化的批判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阐发了一种对量化逻辑的批判。在他看来，量化逻辑是物化思想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核心。所谓“量化逻辑”，即“资本主义”把“现象简化为其纯粹的量的本质，简化为这个量的本质的数字和数字关系形式的表达”的“天性”（HCC，6）^①。资本主义用各种科学来评估和优化投资、

^① 参见中译本第54页：“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强。”——译注

劳动时间、资本积累、商品、权力等。资本主义是积累的社会,其基础是资本的逻辑,它把这个逻辑移入社会的不同领域(如政治和文化),以达到不只积累金钱,也积累决定权和定义权的目的。要积累,就要评估现有的量,后者是识别如何增加它们的策略的基础。在过程的终端,结果也要被量化,以识别在积累过程重新开始时该做什么的策略。资本主义必须发展出更新的关系化形式和更新的生产方式,以达到提高生产力、减少成本和积累资本的目的。因此,资本主义技术的历史是理性化和更新的量化方法发展的历史:

沿着劳动从手工业,经协作和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道路看,我们会发现一种持续趋向更高层次的理性化,逐渐消除劳动者的质的、人的和个体的属性的倾向。(HCC, 88)^①

现代哲学是和理性化的技术一起发展起来的(HCC, 113)。^② 卢卡奇认为,物化把总体简化为局部的操作不限于经济,也影响了官僚制、国家、法律和文化(HCC, 98-100)。^③

计算的逻辑是简化主义的、反辩证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一切拜物科学和一切种类的修正主义的方法论理想,它拒绝这样的想法,即其主题中可能存在矛盾和对抗。”(HCC, 10)^④ 数学逻辑无法“一下子就看到整个系统”(HCC, 117)^⑤,它把解释简化为基本原则(简化主义)并相信世界是可以精确预测和计算的(决定论)(HCC, 117)。^⑥ 卢卡奇(HCC, 89-90)^⑦引用马克思来说明资本主义的量化拜物教:“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他至多是时间的躯体。质不再重要。量决定一切;一小时对一小时,一天对一天。”(Marx, 1847:

① 参见中译本第 154 页:“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译注

② 参见中译本第 186 页。——译注

③ 参见中译本第 167—170 页。——译注

④ 参见中译本第 60 页:“自然科学的方法、一切反思科学和一切修正主义的方法论理想,都拒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和对抗。”——译注

⑤ 参见中译本第 192 页:“但这一限制也只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通观整个体系。”——译注

⑥ 参见中译本第 192 页:“体系的任何一个个别的环节都可以由它的基本原则创造出来,都是由它精确预测和估计的。”——译注

⑦ 参见中译本第 157 页。——译注

127)。卢卡奇写道:“因此时间丢掉了其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冻结为一个被精确界定的、可量化的连续体,里面装满了可量化的‘物’(劳动者被物化的、被机械地客体化的,彻底与其总体人性分离的‘表现’)。”(HCC, 90)^①在最初发表于1921年的论文《教育工作问题》中,卢卡奇(Lukács, 2014:91-92)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和修正主义社会民主提出的机械决定论,反映了资产阶级对量化的力量和自然科学的信仰。与之相对,批判思想必须“彻底摆脱所有形式的决定论”(Lukács, 2014:93)。他强调人的质,比如说,人改变世界的能力。

(五) 重新思考卢卡奇对量化的批判:对大数据分析的批判

大数据分析是几乎所有学术领域量化的最新方法论趋势。它是这样一种方法:收集大量的数据,然后把算法和数学分析(如相关分析)用于这些数据,以达到识别模式、关系、相关性和预测行为的目的。大数据分析使“监控、管理和控制公民”成为可能(Mosco, 2017:8)。随着大数据的兴起,一系列对大数据分析及其对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批判分析也应运而生(Andrejevic, 2014; Beer, 2018; boyd & Crawford, 2012; Couldry & Mejias, 2019; Chandler & Fuchs, 2019; Van Dijck, Poell & de Waal, 2018)。

大数据分析的量化拜物教使像新自由主义杂志《连线》(Wired)前编辑克里斯·安德森(Anderson, 2008)那样没有批判意识的技术爱好者认为,大数据造成了“理论的终结”:“在数据足够的情况下,数字本身就会说话……在面对海量数据的时候,这种(传统的)科学方法——假设、模型、验证——变得过时。”

大数据实证主义的量化方法论无视社会分析的质的方面,如伦理、道德、批判、理论、情绪、情感、动机、世界观、诠释、政治评估、权力、社会斗争或矛盾。这里的危险在于,大数据分析倡导无批判的、工具性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为执行资本主义的统治和支配的主流利益服务。大数据分析的另一个危险之处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因此而被计算机科学和商业研究的组合所殖民,后者试图用工具性的大数据推理来根除批判思考和批判理论。大数据分析是卢卡奇分析和

^① 参见中译本第157页:“这样,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译注

批判的物化工具在历史上的最新发展之一。

陈等人(Chen, Chiang & Storey, 2012)的文章是题目中包含“大数据”的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之一。^①这几位作者把大数据分析识别为在“商业智能与分析 1.0”(应用于通过企业系统收集的结构化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和“商业智能与分析 2.0”(应用于非结构化网站内容的文本和网站分析)这两个阶段之后的“商业智能与分析 3.0”:

大数据和大数据分析被用来描述这样的数据应用中的数据集和分析技术,其所涉及的数据是如此之巨大(从兆字节到艾字节)和复杂(从传感器到社交媒体数据),以至于它们要求先进的、独一无二的数据储存、管理、分析和视觉化技术。(Chen, Chiang & Storey, 2012:1166)

这几位作者认为,大数据分析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Chen, Chiang & Storey, 2012:1168)。他们列出了经济、政治、科学和技术、健康与福利、安全与公共保障领域的纯粹积极的影响,包括“提高销售额和消费者满意度”、增进“透明、参与和平等”、增加“科学的影响”、“提高医疗质量”和“改善公共安全与保障”。陈等人的文章是关于大数据的主流研究的典型,它是高度物化的思想的表达,这种思想认为大数据分析所代表的纯粹量化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并且只会产生在多个方面改善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它不会去分析和讨论可能的负面影响,这是分析抽象化——分析变得抽象,脱离了作为整体的社会及其权力关系——带来的后果。

大数据分析往往会忘记阶级和支配。它的量化拜物教把社会看作一个由大量数据组成的物,而无视构成社会的质。大数据分析是卢卡奇所说的无视“矛盾与对抗”(HCC, 10)和总体的“拜物科学”。

五、结论

我们可以把本文的主要结论总结为:

^① 2018年7月29日 ISI Web of Knowledge 搜索结果:在863个搜索结果中,这篇文章是标题中含有“大数据”的引用率第二高的文章。

第一,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在主客体辩证的基础上构想社会,避免了唯意志论的自发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宿命论。在后期作品中,他澄清了语言和传播在主客体辩证中的媒介作用——传播是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主客体辩证中的中介过程,还有劳动与传播的辩证(劳动的传播、传播的劳动)。

第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说明,意识的物化的客观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结构,意识的物化是通过把支配的结构和实践自然化来为资本主义正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要素。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社交媒体已经变成一个传播媒介,物化意识在其中传播并受到挑战。在像推特、脸书和油管那样的公司运营的社交媒体上,右翼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要素(强力领导、民族主义、敌友之分和军国主义)的传播尤其流行。

第三,文化和媒体劳动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物化。通过鼓励创造性和自己决定的劳动,它显现、创造出一种非异化劳动的灵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再关注这一事实,即这样的劳动往往高度不安全、不稳定。

第四,私有制/逐利、广告和意识形态以新的方式在社交媒体领域、在线上运作,结果是公司、名人和政治精英的利益殖民了线上公共空间。

第五,卢卡奇对物化的批判引出了对技术拜物教和量化逻辑的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这个分析从几个方面来看也很重要,包括对数字决定论和数字实证主义的批判。

第六,数字决定论通过把数字技术呈现为给社会带来要么纯粹正面的,要么纯粹负面的技术变革的自主主体,把数字技术变成神物。

第七,大数据分析是卢卡奇分析和批判的物化工具在历史上的最新发展之一。大数据分析是数字实证主义和拜物科学的一种形式,它忽视了质、矛盾和总体性。它倡导无批判的、工具性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因为被当作物化的工具来使用而起到了为主流利益服务的作用。

《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物化、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的时代依然切题。卢卡奇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批判地分析社交媒体、大数据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互联网技术是怎样被当作物化的工具来使用的。这些新技术都深刻地内嵌于资本主义和支配的结构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数字技术的领域就没有别的可能和别的力量在起作用了。卢卡奇反对决定论的分析,这意味

着在资本主义中,就算剥削和支配无处不在,批判的意识和批判的行动(实践)也永远是可能的。

在物化的计算和技术、量化的工具逻辑中,资本和官僚制吸收了人的活动,破坏了团结。但同时,现代技术也创造出新的合作和社会化的潜能。计算在不同的层面运作。社会主义的社会与技术框架无须废除计算,但需要改变设计,使技术以人为中心,使集体过程中的人控制对技术的设计和使用,使量化服从于以人为中心的逻辑。比如说,社会主义的设计并不意味着废除社交媒体,而是使之真正地服务于社交,不再把对隐私的侵犯、不透明的算法、定向广告、个人主义和重复的积累当作设计原则,代之以对隐私友好的、人与人直接交流的、集体生产的、合作的、团结的、共创的、透明的、开放算法的原则。

今天,活动人士也在用像互联网这样的数字技术来挑战剥削和支配(Fuchs, 2014)。像维基百科和另类线上媒体——如《民主快报》(*Democracy Now!*)和《另媒》(*Alternet*)——那样的数字共享空间项目,挑战了资本主义对数字技术的形塑。而且,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和平台合作社也有挑战数字公司巨头逻辑的潜能(Fuchs, 2018b)。这些尝试都致力于创造一片非物化的、基于公有的和公共的、基于共享的数字媒体风景。我们可以从卢卡奇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是,只有把自己组织为政治集体,参与改造技术和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有批判意识的人,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数字媒体风景,超越资本主义互联网,走向基于共享的互联网。单靠技术或单个个体都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人的实践才能创造基于共享的互联网和社会主义社会。

卢卡奇强调,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上打败物化”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工人委员会(HCC, 80)。数字时代,用户是生产者,数字劳动者多种多样。在这样的时代,创造劳动者和用户所有的平台合作社和公有的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是工人阶级反数字资本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此外,今天我们也发现在社会斗争中,社交媒体和应用也会被当作传播的武器来使用。形形色色的占领运动(Fuchs, 2014; Qiu, 2016)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数字资本主义中阶级斗争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借助互联网发生的零工经济劳动者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Cant, 2020; Ravenelle, 2019; Woodcock, 2019)。数字媒体在今天不但是物化的工具,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为当代数字无产阶级提供了

“扬弃自身,通过成功完成自己的阶级斗争创造无阶级社会从而完善自身”^①的可能性(HCC, 80)。

参考文献

- Anderson, C. 2008, “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 *Wired Magazine* 16(7).
- Andrejevic, M. 2014, “The Big Data Div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 Beer, D. 2018, “Envisioning the Power of Data Analy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3).
- Benjamin, W. 1934, “The Author as Producer.”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World: Belknap Press.
- Boltanski, L. & È. Chiapello 2005,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boyd, D. & K. Crawford 2012,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 Brecht, B. 1932, “The Radio as A Communications Apparatus.” In M. Silberman ed., *Bertolt Brecht on Film & Radio*, London: Bloomsbury.
- Cant, C. 2020, *Riding for Deliveroo: Resistance in the New Economy*, London: Polity.
- Carlson, M. 2020, “Fake News as An Informational Moral Panic.”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3(3).
- Chandler, D. & C. Fuchs eds. 2019,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 Chen, H., R. Chiang & V. Storey 2012,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 From Big Data to Big Impact.” *MIS Quarterly* 36(4).
- Couldry, N. & U. Mejias 2019, *The Costs of Conne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nnemann, R. 2017, “Georg Lukác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the Idea of Socialism.” *Contours Journal* 8.
- Duffy, A., E. Tandoc & R. Ling 2019, “Too Good to Be True, Too Good to Share: The Social Utility of Fake new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https://doi.org/10.1080/>

^① 参见中译本第 147 页:“无产阶级只有扬弃自身,只有把它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实现无阶级社会,才能完善自身。”——译注

- 1369118X. 2019. 1623904.
- Ernst, N. , S. Engesser, F. Büchel, S. Blassnig & F. Esser 2017, “Extreme Parties and Populism.”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9).
- Fogarasi, B. 1983, “The Tasks of the Communist Press.” In A. Mattelart & S. Siegelau eds. ,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2: Liberation, Socialism*, IG/IMMRC.
- Fuchs, C. 2014, *Occupy Media! The Occupy Movement and Social Media in Crisis Capitalism*, Winchester: Zero Books.
- Fuchs, C. 2017,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Fuchs, C. 2018a, *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 London: Pluto.
- Fuchs, C. 2018b, *The Online Advertising Tax as the Foundation of A Public Service Internet*,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 Fuchs, C. 2020, *Communication and Capitalism: A Critical Theory*,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 Gharib, S. 2018, “Intel CEO Says Data Is the New Oil.” *Fortune Online*, June 7.
- Gill, R. 2011, “‘Life Is A Pitch’: Managing the Self in New Media Work.” In M. Deuze ed. , *Managing Media Work*, London: Sage.
- Harvey, D. 2018, “Universal Alienation.” *TripleC* 16(2).
- Honneth, A. 2007, *Disrespect: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Polity.
- Humphrecht, E. 2019, “Where ‘Fake News’ Flourish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13).
- Jaeggi, R. 2014, *Alie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ukács, 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HCC)*, London: Merlin Press.
- Lukács, G. 2014, *Tactics and Ethics*, London: Verso.
- Marx, K. & F. Engels 1846, “The German Ideology.” In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Marx, K. 1847,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In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6,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Marx, K. 1867.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 Maxwell, R. ed. 2016,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London: Routledge.
- Morgan, S. & J. Lee 2018, “Trump Voters and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Sociological Science* 5.

- Mosco, V. 2017, *Becoming Digital: Toward A Post-Internet Society*, 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
- Müller, P. & A. Schulz 2019, “Alternative Media for A Populist Audienc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9.1646778>.
- Qiu, J. L. 2016, *Goodbye 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Springfiel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avenelle, A. 2019, *Hustle and Gig: Struggling and Surviving in the Sharing Econom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sa, H. 2013,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ier, S., L. Posch, A. Bleier & M. Strohmaier 2017, “When Populists Become Popula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9).
- The Economist 2017,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Resource Is no Longer Oil, but Data.” *The Economist*, May 6.
- Trump, D. 2014, “A Country that Cannot Protect Its Borders Will not Last.” *Breitbart*, July 11.
- Van Dijck, J., T. Poell & M. de Waal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bster, F. 2014,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Woodcock, J. 2019, *Marx at the Arcade: Consoles, Controllers, and Class Struggle*, Chicago: Haymarket Books.